

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分校文史系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办编辑 聂子麒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95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李永华

封面设计:邱云松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(第四十三辑)

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盐道街3号)

彭州市国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1/32 印张 7.5 插页 1 字数 170 千
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220-02718-4/K·379 印数:1-3000册

定价:4.5元

目 录

- 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 田一平 (1)
- 纪念田一平同志 楚图南 (51)
- 自贡和平解放简述 杨续云 (54)
- 忆我父亲罗文谟的政治与艺术活动 罗荣泉 (67)
- 解放前我在四川水利工作中的片断回忆 熊达成 (108)
- 历史的见证 邓汉祥 (127)
- 我所知道的张群 官大中 (149)
- 一鳞半爪忆张群 陈雁 (161)
- 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 陈书农 (183)
- 我任中国驻日本占领军先遣官的经历记 廖季成 (203)
- 川军白骨葬武陵 张登上 (215)
- 泸州龙舟竞渡的回顾 毛子安·赵永康 (218)
- 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四十二辑刊误 (236)

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

田一平

编者按：田一平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、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。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和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，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，为发展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无私奉献。即使身陷囹圄，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，团结难友，争取同情者；积极同反动派巧妙周旋、斗争。1993年1月30日他在成都逝世，享年86岁。在辞世前，即1992年12月14日完成了记录他铁窗生活的《四个监狱》，以教育后代。现将原文刊载，以飨读者。

《四个监狱》之一——将军衙门

1947年2月，蒋介石勒令中共驻南京、上海、重庆等地的办事机构撤回延安。5月9日，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“非法组织”、又炮制了“戡乱动员令”。以加紧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。6月2日成都的特务导演了一幕闹剧，以便浑水摸鱼。这天，由特务装扮成老百姓裹胁一批人去新南门米店抢米。那里的秩序相当混乱。

特务张网以待。米店对面相馆里有两个青年出于好奇，架起相机正待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，当即就被宪兵、特务抓住。诬指他们煽动风潮，推波助澜。后来又大做文章。竟然捏造出他们是“共产党，曾去河南洛阳与共产党联系过”的罪名而将他们枪杀。我当时任《华西晚报》总经理（之前任《华西日报》的经理）。报馆里有几个青年人跑到米店附近去看热闹，我批评他们：“人家在搞圈套（这是1940年北门外抢米事件的翻版）。你们还不晓得，还要自己送进去”。我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开会。对他们讲：“现在形势险恶，各种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。你们愿意走的就走，不愿走的，作好一切准备，连供词都要考虑好，我是不走的，因为我是民盟的，我一走，好像我们民盟的人心虚”。

开完会，地下党员胡春浦来找我，他那时在东大街开了一个“大有”字号的五金商店作为掩护，进行革命工作。在“川康绥靖主任公署”内有熟人能够探得一些内幕。他说：“我得到可靠消息，特务要捕人了，这次和前几次不同。逮捕的面宽，你要隐蔽一下，到乡下去”。我点了点头，匆匆而别。我本已有到乡下去暂避一下的打算，转念间，出于党性，想到中共四川省委要我们成立文化小组的同志杨伯恺而放心不下。就到杨伯恺家里和他商量，对他说：“局势很紧。我们是不是避一下”。他坚决地说：“不走，不走，顶住。第一，张表老还在上海。如果我们出了事，张表老会讲话的。第二，1940年，特务要逮捕我，邓锡侯通过张雪岩给警备司令部写了个条子。特务未敢下手。（邓锡侯、张雪岩、杨伯恺都是四川营山人）这次如果要逮捕我，我想邓锡侯还会帮忙”。我说：“好嘛，那我们就走”。1950年，我到北京向张表老汇报此事。老表笑着说：“那时候我自身难保，说话有什么用处”。

6月2日深夜，暑气未消，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我警觉

到：特务来了。我迅速起床，刚要跨出房门，特务已破门而入。一群特务，头上包着毛巾，手持短枪，个个如狼似虎地逼着我，有一个头目吼问：“你是哪一个？”“我是田一平”。他命令我站好，不准动。开始搜我的家，楼上楼下，寝室厨房，把家里的人集中起来，挨个询问。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凶恶的阵仗，不知所措。五岁半的儿子站在床上嚎淘大哭，有个特务问我：“你那个证明书在哪里？”我问“什么证明书”？他说：“就是政府准你办报的那个通知书”（即晚报的出版登记证），我说：“在柜子里”。特务找了一会儿没找着，又出房来问我：“究竟在哪里”？我趁机回房，顺手抓了一件棉袄披在身上，并把儿子田林熙抱起来。他失神地看着我，眼角挂着两行眼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搜查完毕。那个小头目拿出一根布带子。叫我把孩子放下，把我的两手朝后死死捆起。我的爱人喻素莹，看着这一切悲伤地流着泪。特务们把我推推搡搡地押了出来。走到华兴正街，只见满街都站着武装特务。他们把我推上吉普车。不一会儿，《华西晚报》的营业主任马天一，营业员何良臣也被抓上了车。还抓了一个工友杨祐山，车上，何良臣紧挨在我身旁。感觉他在发抖。我用手在他脚背上划了几个“不，不”。他才镇静下来，车很快开进了宪兵第五团团部——人们熟悉的将军衙门。

将军衙门，这是四川特务机构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所在地，又兼作政治犯的看守所。走进大门，只见满院的警察宪兵，强烈的灯光照射着每个角落。从右边一道小门进去是个小院子，这里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。特务把我带到办公室，办了登记，告知我是14号，并且交待在监狱只准说号数，不准说名字。特务随即把我的近视眼镜取下。然后把我带进这小院子的一间牢室。此时，被捕的人不断地从小门进来，不愿进牢房的特务就用棍棒打。一时

间，惨叫声、吼叫声、棍棒声混合在一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见一青年睡在床上，显然也是才来的，我问他“你是哪一个”，他说：“田先生我认得你。我的情况过两天告诉你”。后来知道他是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的张大昌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进来一人，是《华西晚报》记者车辐。他一进来就站在窗口旁，一边朝外看，一边说：“于邦齐（于渊）来了，手朝后捆着”，“杨伯恺也来了，眼睛被蒙着。”车辐还喊了一声“马副官”。我听到喊马副官时，心里紧张了一下，原来、我家住的华兴街大享里，是国民党六十军我族叔田冠五的驻蓉办事处。马副官是办事处的副官。办事处的事我不知道。但里面有军事文件、枪支，特务们一惯捕风捉影，栽赃陷害。我担心他们会通过马副官来套我，抓住一些事栽到民盟头上来治我的罪。在逮捕我时，从军部办事处搜到两支20响的手枪。据此可以诬我私藏军火，组织暴动，把个人的事扩大为民盟的事。幸亏特务从我家搜走之后就私自打来吃起。因而也就不提枪支的事了，当晚被捕的大约有三十多人，《华西晚报》孙文石、刘慕宇、严士奇；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副经理，厂长罗启维、叶青东等都被捕了。其他人多已忘记，其中还有两个女的，一个叫兰继芬，另一个叫王克毅，是彭玉民的妻子。本来要抓彭玉民，他跑了，则抓了他的妻子，问不出什么过两天就放了，兰继芬由刘文辉保释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成都市这次大逮捕是由四川省特委会布置指挥的。省特委会主任邓锡侯圈定名单时，初不拟圈定张志和、范朴斋、田一平、杨伯恺、于邦齐。特务骨干竭力反对，说什么“这些人身份重要。已经呈报中央，若不逮捕，说不过去”。最后邓还是圈定了，但特别关照张志和、范朴斋二人（因与他相熟识）由他亲自处理，用小车送他们到东门外关在“厚生农场”。过了十多天就放了。这次被捕的全部关押在将军衙门里。

将军衙门是清政府留下的一所军营。国民党政府利用它来作特委会，关押政治犯，它已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我们住的小院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。墙上有许多枪眼，大树上也架着机枪。从各个方向都可以扫射。小院外面有间大房，住着宪兵第五团的武装人员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正在巡逻。监视着小院里的一切。小院被包围得严严实实。清风不入，阴森无光，只一道小门可以进出小院，正面是小小三间平房、砖木结构，分别是一、二、三号牢房，右侧也是平房，一排六间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号牢房。特务把我先投入了第四号牢室。

室内很小，放了四张单床后；就只剩很少的一点空隙，还要放一个尿桶。与我同住一室的除了张大昌、车辐、还有司机陈中平和邛崃的王伯高，陈中平与王伯高挤在一床睡。王伯高曾到过延安，后派回四川做策反工作。他利用自己的地主家庭身份，参加了袍哥，联络了一些开明人士。他以操袍哥、吃鸦片烟作掩护，装成一副十分颓唐的样子，但未能躲过特务们鹰一样的眼睛，竟被从成都很有名气的袍哥大爷冷开泰家中抓来了。来时鞋子都没穿，只穿了件汗褂。但仍显得倔强，有骨气，特务们经过精心研究，把我、罗启维、孙文石、张大昌、陈中平、刘慕宇、颜士奇、张政弟八个人调到了第五号牢室，我们称之为土牢，专关死囚。这一间牢室与别的牢房不一样。不仅大一些，而且墙壁之外还加了一层土坯和石头。低矮而潮湿，伸手能摸到屋顶，灰尘和泥土亦随之掉下来。木质地板有很多洞，老鼠日夜光顾，墙上两个小小的窗口，远不足以让我们七个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此外，还缺少用水，时值盛夏，我们这小小的陋室，异常闷热。遇着下大雨，室内就灌满了水，景况就更恶劣了。随后，我又被调到第三号牢室与杨伯恺，于邦齐、叶青东四人住在一起，大概是“特殊”待

遇吧！后来才发现叶是来监视我们的，每天我们唯一盼望的是仅有一次的 10 分钟放风，大家先排队进厕所，一次进去两个人，时间很紧，上厕所之后，剩余的时间可以在天井里走动走动。至于我们的囚饭，一天两顿。每人一个钵钵，菜是清水煮白菜，或咸水煮萝卜之类。没见一点油荤，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，生活中重重的磨难与敌人精神上的压迫。不仅没有使我们屈服，反而使我们每个人的意志经受了严格的锻炼。

虽然不能大声讲话，但我们总是借放风、打饭的机会悄悄地三言两语互通情况，交换意见，相互鼓励，我们还采取讲故事、谈工作，讲笑话等多种方式来转移视线。淡化思想上的压力，缓解目前的痛苦。我们互相激励要坚持，要有信心。比如：在室里，我们八个人，陈中平讲他开车的技术，罗启维讲他办荣利印刷厂，在办厂时上当受骗的事。刘慕宇讲他在《新华日报》里的事。我讲了毛主席、周副主席在重庆双十会谈里的一些情况。还讲了上党战役的胜利。凡此种种都帮助大家渡过了那监禁的苦涩困难的日子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大家的情绪，鼓舞了士气。

在我被捕的当晚深夜，特务刚把我带进四号牢室，一会儿，就又有特务喊：“14 号，跟我走”。出了小门，向左拐进一条巷子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去审讯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是审讯室，高柜子的后面座位上，坐了四个审讯的特务，此时天还未亮。他们首先问民盟的情况，那凶狠的吼叫，怒目金刚似的面孔，威威乎严如阎王殿，这就是敌人的过堂。我早有思想准备，镇静地回答：“我在民盟的情况，邓锡侯同你们的负责人都知道，我同杨伯凯、范朴斋、张松涛四个人，曾经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前往川康绥靖公署会见过邓锡侯，你们不是不知道”。随后，他们又问四川民盟基层组织的情况。我说：“我是民盟四川省委的秘书长（盟省委委员有：李璜、

宋连波、杨叔明，他们三人是青年党。还有：张志和、杨伯凯、马哲民、李相符、沈志远、我，一共九个人）。基层由基层组织掌握。我不管。”又问《华西日报》、《华西晚报》、民盟的西区、北区的组织都有哪些人”，我一一推了：“这些基层情况我都不知道”。特务很狡猾，在问我民盟情况的时候，突然插一句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参加 CP 的”？我答：“没有呀”，特务说：“据我们调查，你是共产党”，我说：“你们的调查不确实”。特务也确实没有掌握到我的共产党关系的证据，对这一点也就无法深入。提了一些别的问题之后，这次审讯就结束了，回去时，从另一道门出去，我看到隔壁那间屋里有高高的杠子、木架、绳子、火炉等刑具，我猜想，让我走这道门，全部刑具展现在眼前，意在让我明白，如不老实坦白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。此时，我也在想：从审讯我的情况分析，敌人抓我们，重点是要打击民盟以打击共产党，民盟是公开的争取民主，反对独裁的进步组织，只要不牵涉到共产党就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因此，我决定今后狱中的策略。就是以民盟为掩护，装成一个十足的中间派。在第一次被审讯之后。又被提问过多次，讯问的方式时有变换，一般是不依形式、地点，特务想起什么问题，就喊去问一次，所提都是关于民盟的事，正如我所分析的；我始终以民盟的事作借口。凡是已公开的我就承认，就答复，凡问有关共产党的事一概答不知道。敌人还从杨伯恺、于邦齐口中打探我的情况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。凡被抓进来的，每个人都是被审讯了的，内容方式各不相同。大多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，张大昌，因他是民盟的联络员，特务就从联络员的角度追问他联络了哪些组织？哪些人？问不出什么就用绳子吊在梁上。于邦齐（于渊，中共党员）川军少将，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，积极从事民盟的活动，是民盟北区区分部主任委员，敌人以军事法庭的方式

来审讯他，特务们身着军装。这位铮铮汉子在敌人残酷高压之下只承认是盟员，凛然不可犯。1949年12月7日，国民党大屠杀之夜，他与王伯高、杨伯恺等众多的难友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（即是今天的成都十二桥烈士），与此同时，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上，因不知其已牺牲还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。在审讯中与案情无关的就被放出了。

由于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民盟的什么东西。于是他们就逼迫难友悔过退盟。我们则开展了不悔过、不退盟的斗争。

对我，他们就来软的，讲朋友、讲同事、或找人来试探。

一天，一个姓陈的法官来劝说我：“我们两个曾经都是川康绥靖公署的，有话好说嘛”，我说：“我嘛，是民盟的，有话好说”。二次又来说“我们两个说点秘密的话：我要调职了。你要申请退盟，由我办，快得很。我走了，就难办罗”。我不理他，转而又去游说杨伯恺，他们找了一位杨伯恺的好朋友来转达邓锡侯的话：“你只要在申请书（即退盟悔过书）上写上杨伯恺三个字，写好后秘密保藏。别人不知道”。杨伯恺对我说：“特务纠缠着我，怎么办”？我告诉他，我抱着不理的态度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也这么办”。以后特务找他劝说时，他说：“我出去可以，要群众来欢迎我”。特务恨恨不已，说“杨伯恺是顽固堡垒”。难友中一些人对特务的高压、审讯，开始时有些凄凄惶惶，愁蹙不安，看到杨伯恺和我的态度，心始稍安。但是也有人动摇屈服。有一人耐不住监狱里的“寂寞”，竟然写了悔过申请书，履行了手续，登报退出了民盟。出狱后，他按照狱局的要求，还定期来汇报。他不仅自己动摇、屈服，还引诱、劝说了两人，拉他们下了水。还有个共产党员也经不住考验，对我说：“我决定出去。”我说：“你想后果哟。”他说：“我想过，决定出去。”临到他要走的时候，我站在房门口，他说：

“我要出去了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我有说不出的苦衷，请你们原谅（解放后，此人给我写过信，并叫他爱人来找我谈，说他年轻，犯了错误，请组织原谅，来信我当即交予川西原党委组织部马识途同志了）。

还有，就是罗启维。特务们以为他性格软弱，容易突破，采取许多办法，拖他下水，先对他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你的妻子，两个儿子都很苦。他们希望你出去。出去后，他们的生活解决了，你的生活也解决了”。我就对罗启维说：“他们这些话都是骗你的，听不得啊”。以后特务又把罗启维的舅舅找来继续软化：“你爱人身体不好，在生病”，说了许多苦楚都未能使他动摇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牢室里还出现了一个插曲，幸而没被追究，未闹出大事来，原因是于邦齐跟叶青东吵架，几乎打起来，叶青东是个律师，曾与于邦齐在杨森下面共过事，有隔阂。现在往事重提，就闹开了。叶本来是特务利用来监视我们的，正好，他借此报复。去汇报说：“杨伯恺在狱中宣传共产主义，骂国民政府”如何如何，还上报到邓锡侯那里去了。我们就批评于邦齐太不应该。于也深感悔恨，连说：“好好好，以后坚决改”。

我们被关在牢室里，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心里颇为着急。于是就策划争取看守和分化特务的工作，希望通过他们与外面取得联系。当时，我们已经认得几个看守，管理上，似乎也有松动。正好，我又与杨伯恺、于邦齐、叶青东调在一个牢室，这就便于我与杨伯恺商量工作了。

我和杨伯恺共事很久，相互比较了解，这次被捕前，我还特别去与他商量。我们于1940年相识，当时我任《华西晚报》经理。新任社长是罗忠信，李次平任总编辑，编辑唐尊九、罗、李、唐三人对我说：“既然社长、经理都换了，主笔照例也该换一换。有

个老主笔杨伯恺，为避免特务迫害，住在西门外土桥，可以把他找来”。于是唐尊久、李次平和我三人拿起聘书，前去邀聘他作了主笔，他每天写好的稿子，先找人誊好送到报馆，以免因笔迹暴露他的行踪。这样我才知道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，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共产党人。根据党的指示，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，他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主同盟。1946年，杨伯恺在《民众时报》任总经理兼主笔，聘请中共党员漆鲁鱼任总主笔（张澜任社长，经费由刘文辉提供）。有一天，漆鲁鱼把我、杨伯恺、李相符请到他的总编室，从眼镜盒中拿出一个普通的信笺，正面是几句家常话，只见他翻过来，用显药水把它显出来，原来是中共四川省委写的命令：“兹经四川省委决定，成立成都地区文化工作小组。李相符、田一平、杨伯恺为小组成员，漆鲁鱼任支书。不久，漆鲁鱼、李相符相继离开，就剩杨伯恺我们两人坚持在成都。现在狱中的斗争，当然是我们共同的斗争。非常遗憾的是，自我被转移到重庆之后，我就与杨伯恺分手，再也没有见面了！不幸，他在解放前夕，被国民党特务惨杀于十二桥，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就义了。成都解放后，中共川西区党委在东胜街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，贺龙同志特别向危淑元同志祝酒，说：“杨伯恺同志牺牲了，我们很难过。伯恺同志为党作了很多工作，是个好同志。”当时，马识途和我都在那里，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也很难过！

首先，我们分析了看守我们的宪兵的情况，认为：他们还是青年，多是为了职业、生活、就是有的小特务也是被骗来的，并不都是顽固分子。于是，我们发动难友，分头试着与他们接近，以多种方式进行工作。我和他们摆龙门阵，拉家常：“你们不是想进职业学校，考大学吗？”“我们多是教书的，报馆的，可以帮你复习文化嘛”“我们的熟人多，在社会上还是有活动能力的，以后还

可以多方面帮助你们”，“你们现在这个工作还不是出于不得已！”……杨伯恺就给看守们讲历史，教国文……经过不断的工作，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，甚至还向我们讲心里话，宪兵小郭说：“长官讲，你们这些人坏得很，实际接触以后，才觉得你们并不坏，心眼好！”渐渐地，这个渠道通了，我们非常高兴。他们的态度变了，能帮我们与家里人联系，家里的衣物、吃食已能经常送到。甚至还悄悄夹带一些书报进来，使我们知道外面的许多情况。我们知道6月2日重庆也进行了大逮捕。邛崃县敬堂中学的一些进步教师，被抓进来了，这个中学是张志和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办的。因而我们把这些教师的被捕通过看守告诉了张志和，他便把他们营救出去了。我们还常常请看守帮我们买东西。我们关在那里，处境恶劣，伙食坏，而隔壁恰好有家饭馆。他们就帮我们买来回锅肉、盐煎肉、吃得来皆大欢喜，王伯高竟然忘乎所以的边吃边赞美地说：“吃，这是成都市炒得最好的！”

不幸，这些活动被主管的特务发现了，斥责这些看守被“赤化了”，一天还把宪兵，看守和一些特务集合在天井里，当众惩罚一个姓李的看守，以警告他们不要帮我们做事。并且把原来的看守调走了。可我们正好利用这件事来向新看守说明特务的残酷、心狠、手辣、恶毒。我们仍一如以前，努力接近他们，争取他们的了解，帮他们提高认识。不久，这些新来的看守，仍然不把我们当坏人，帮我们传递消息，买东西。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八月中秋的一天。

中秋那晚，看管人员过节，他们猜拳行令，喧嚣热闹。我们当然没有份。就各自呆在牢房里，夜深了，有人在门窗下轻声喊：“杨先生、杨先生”。起身一看，是看守小郭，他手里包着几个月饼递过来，说：“你们吃”。就走了。我们刚睡下，又听见门外有人

小声地叫：“杨先生、杨先生”借着月光一看，是挨打的那个小李。他包着一个鸭子递进来。并说：“你们吃，骨头丢在尿桶里。我和值班的商量好了，我代他值班。你们放心地吃，不要紧的。”听到这话语，看到这鸭子，我们一时热泪盈眶，心情万分激动。“我们的争取成功了、政治胜利了！”看到了我们前途的曙光，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。

10月18日，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心的日子。那天是星期六，管我们的鲁管理员，照例是这天下午要回家，而他却未走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令人怀疑。晚上九至十点钟的时候，只听外面闹哄哄的。接着二三十个人冲进来，有人喊：“在3号在3号”，3号就是我住的牢房，长电筒照着我，喊道“14号，把行李收拾好”。我心里一怔，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，站在窗口喊：“鲁管理员，什么事嘛”，他说：“你收拾东西，不要管”。我忙着收拾完毕，跟随他们来到了办公室，一个胖子，大家喊他漆组长，大约是个小头目，叫我走过去，他用皮带把我双手朝后捆起，然后又用布带把我双眼、口蒙起来。随后，喊了一声走，一群人齐声高喊：“抬起”，众人用手把我高高托起。有手软的，管理人员骂骂咧咧：“三天不吃饭就手生了”？这帮人“嗨哟……”地高呼着，这是旧政府衙门的规矩。杀人前的一种仪式——闹堂。这群人把我推了出来，拥上一辆三轮车，我被蒙上眼睛，虽然看不见，凭我熟悉的路径，可以感觉到行走的方向。如果出大门朝右拐出通惠门。就是去刑场。我感觉是朝左拐，朝东走，又东拐西拐了一阵，大约走了一小时。下起了毛毛细雨。沿途静寂无声，车停、敲门、内有人问口号、一问一答。门开了，我被推进一间屋子，解开了蒙我眼睛、嘴巴的布，我定睛一看，这是一间小室，一桌、一凳、一床。听到外面的人正在和重庆通电话，有电话机。自然是个机关，

我了解这是什么机关，因此就问看守：“我要小便，行不行”？他想了—下说：“可以”。把我手上的皮带解了，我走出房门，借机四面看了一下，前后两排房子，后排房内在打麻将。有女人的声音，我猜想这可能是个特务机关，回来后见看守已睡在床上，我就在地上背靠着墙坐到天亮，我想，他们打电话到重庆，有可能把我弄到重庆。天快亮时，漆胖子来喊：“起来起来”。他说：“田先生，你我两个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请你到重庆去，把—件事说清楚，没有什么不得了的，你要规矩些。不准叫唤，不准说话”。这下我明白了，是到重庆，放心了，但是为什么？又模糊不清，给我吃了早饭，叫人理了发，从院子出来，回头看，哦，原来这地方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娘娘庙街22号特务蓉站。在朝外面走的路上，漆胖子又打招呼：“田先生，不要乱说哟”。我说：“知道知道”，门口停了两辆吉普车。我和漆胖子上第一辆，抬脚上车。不禁使我大吃一惊。只见胡春浦坐在车上！这次坐牢以后，我的对敌策略是保持民盟的身份，且以盟事为搪塞其它的事概不承认，共产党的事概不牵连。可是此时此地，你所不愿牵连的人恰恰就在身旁。莫不是因同案而向重庆发落？抑或他告发我而去重庆作证？种种疑窦，—时难解，心神不安。但不能不上车了。漆胖子坐中，我和胡春浦坐两边。直视前方，不敢斜视；可心里—直在嘀咕。车子快到凤凰山机场了，胡春浦不慌不忙递向漆胖子—支烟说：“漆组长，请抽烟”。向我暗示，组长是个特务头子，接着又还说：“漆组长，我这几年身体不好，在害病。做了点小小生意，那晓得李荫枫这个狗日的乱说我—些，事情的来由我不清楚”。胡春浦这个人确实机灵过人，几句话实际上在向我递点子：事情出在李荫枫身上，我们之间没有牵扯；暗意明传，我已心领神会。漆胖子立即阻止：“不说不说，到重庆去讲”。车到了凤凰